

戰後香港基督教的發展，進入全新階段。本章以香港「重光」為起點，闡述基督教如何回應中國及香港處境的變化，以及從「難民時代」到「本土社會」的形塑。<sup>①</sup>



## 一、香港基督教格局的重構

### （一）1945：戰後的「復原」

1945年8月香港「重光」，香港基督教在一片廢墟中展開重建。1946年，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聯會恢復運作，李求恩會吏長當選為主席。<sup>②</sup>各宗派及教會也陸續開展各項事工。

戰後重建，也涉及靈性層面。聖公會的鍾仁立指出，多年戰爭，基督徒在肉體及靈性上均受到重大的衝擊。教會更應肩負起培育靈性的責任。<sup>③</sup>1946年4月22日早上8時，戰後復活節崇拜於中環瑪麗操場（花園道口）舉行，由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總幹事譚沃心證道。<sup>④</sup>同時，自1937年抗戰起停辦的「培靈研經大會」，亦於1946年復會。是次講員為鄭德音牧師、彭勵

<sup>①</sup> 本章部分內容，選材於拙著：〈延續與斷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載於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第二章；〈戰後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回顧〉，載於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文字，2018），第一章。

<sup>②</sup> 〈七十五年來大事記〉，載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75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1990），頁80。

<sup>③</sup> 鍾仁立：〈發刊詞〉，載於《港粵教聲》復刊第1卷1期（1946年11月），頁1。

<sup>④</sup> 〈全港基督徒今晨舉行崇拜〉，《工商日報》，1946年4月22日。

牧師及戚慶才牧師。<sup>①</sup> 1947年7月，聯會決定開展三年奮進講道會。

此外，香港教會在文字出版方面，也呈現新機。除了淪陷期間停刊的宗派及團體刊物陸續復刊外，也有好些新刊物出版。如《靈恩月刊》（劉粵聲主編，1946年2月創刊）、《晨星報》（吳恩溥主編，1947年2月創刊）、《靈磐報》（鍾文昭等主編，1947年4月創刊）及《晨聲日報》（羅明佑主編，後改為週報）。上述新創刊物，主要以傳福音、培靈、查經為主，反映教會期許從屬靈角度，回應戰後香港社會的訴求。

復員期間香港教會對中國局勢亦甚關注。早於1946年5月，便發動為救濟內地難胞獻金，共得國幣2,388,000元，交由華僑報社轉匯內地。<sup>②</sup> 隨着國共內戰爆發，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聯會於1948年2月出版的《聯會月刊》內，亦刊登〈公啟〉，表達關注：

啟者，自世界第二次大戰停息後，中國本欲藉着時機而建設一新中國，使人民得享永久和平之幸福，不料建設未始，國難重臨，干戈復起於國內，以致民窮財盡，民不聊生，從此以往，國家漸臻於敗亡而已，深感痛惜，基督教聯會昨董事局開會時討論國家現局情勢，人民日入水深火熱中，從何法而解救乎，國勢變化如此嚴重，基督徒亦為國民之一分子，對於愛國之熱誠不後於人，遂議決從民國卅七年一月一起，加緊為國家祈禱，向上帝呼籲，求上帝赦免吾儕之過犯，早賜下和平，使中國人民實踐憲法，完成建國之責任在案，用特通佈各教會，請本港各公會凡在主日崇拜及家庭祈禱會時，或其他集會中，特別

<sup>①</sup> 培靈研經大會早於1927年在廣州開始。自1928年起每年7月在廣州舉行，到8月便移師香港。抗戰期間因戰亂停辦，至1946年復員後復會。1949年8月於廣州為在中國內地舉行的最後一屆，1951年起在香港復辦，易名「港九培靈研經會」。黃原素：〈培靈研經大會的起源〉，載於《港九培靈研經會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香港：港九培靈研經會，1978），頁14。

<sup>②</sup> 〈七十五年來大事記〉，頁80。

加緊為國家祈禱，仰懇知照是為切盼。<sup>③</sup>

1948年6月，香港中華基督教聯會向香港政府註冊為法團，並易名為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sup>④</sup> 此時，香港教會已恢復戰前隸屬於華南教會的格局。誠然，因國共內戰而帶來的政局變化，也預示着香港教會正面對另一個新階段的挑戰。

## （二）1949：新格局的形成

### 1. 原有「六大宗派」的改組



劉粵聲在《香港基督教史》中將浸信會、倫敦會、聖公會、巴色會（崇真會）、禮賢會、循道會、公理會稱為「七大公會」。七大公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也是最早踏足中國（華南）傳教的差會組織。後來，倫敦會與公理會參加了中華基督教會，「六大宗派」的格局於焉形成。其實，直至1949年前，六大宗派在港的發展，必須置於相關差會及宗派的華南教區的脈絡下理解。

中共建國前後，華南地區各教會急謀應變，例如循道公會華南教區、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及兩廣浸信會方面，先後召開多次應變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共產黨的挑戰。一般而言，各宗派及組織的部署大致相同，一方面重申差會機構暫不撤退，但另方面又在港設立財政機構或辦事處，並將契據及檔案移至香港，以為後着。<sup>⑤</sup> 換言之，從差會的角度，即或中共掌政，仍期望

<sup>③</sup> 〈特別報告〉，載於《聯會月刊》第一期（1948年2月），頁4。

<sup>④</sup> 〈七十五年來大事記〉，頁80。

<sup>⑤</sup> 熊真沛：〈解放前後帝國主義傳教士在廣東的陰謀活動〉，載於廣東省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6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頁111-124。

可以留守中國，而香港教區主要是扮演大後方的角色。

不過，1950年底，西方差會機構及傳教士留在中國的主觀願望已變得不切實際，撤出中國已是大勢所趨。隨着差會撤退，復加內地原有的宗派組織推行三自革新，割斷與差會的一切關係，原有的華南－香港格局瀕臨崩解。各宗派轄下的香港教區，一方面要接收來自內地的資源，另方面也得因應形勢作出改組，建立獨立的香港教區。茲以六大宗派為例，略作說明：

聖公會方面，香港及澳門原同時隸屬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華南教區）及維多利亞教區。先是1951年5月，廣州慕容賢主教致函香港，表示在國家政策下，希望何明華（R. O. Hall）能辭去中華主教院主教之職務，並謂中華聖公會勢必要與香港聖公會斷絕關係。<sup>①</sup>7月6日，港澳地區聖公會自立為「聖公會港澳教區」，通過議案：（一）華南教區現因種種關係，港澳教會與廣東教會應即分離，港澳成一教區，廣東成立一新教區；（二）港澳教區即日起與全國中華聖公會總議會組織上完全脫離關係；（三）港澳教區自動仍保持中華聖公會之信仰與禮儀。港澳教區仍由何明華出任教區主教，專注發展香港和澳門兩地聖工。<sup>②</sup>7月7日，全國中華聖公會常務委員會正式照會港澳地區聖公會，指其通過議案接受華南教區提出與港澳兩地斷絕關係的要求，以及不再承認何明華為中華聖公會主教。1951年起，港澳教區從未隸屬於任何教省，卻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以全世界聖公會主席之職權，為教區的轄治權人。<sup>③</sup>

禮賢會方面，禮賢會香港區會與中華禮賢會總會關係中斷後，乃於1951年6月獲香港政府批准註冊成為「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法團。巴色差會鑑於崇真會香港區會與內地總會中斷聯絡，亦自1952年起改組成「香港

<sup>①</sup> Deborah Ann Brown,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 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1–92.

<sup>②</sup> 〈聖公會退出世界協進會〉，載於《天風》總275號（1951年8月4日），頁11。

<sup>③</sup> 《香港教會名錄：一九五六》（香港：基督教輔導出版社，1957），頁22。

崇真會」。<sup>④</sup>

美南浸信會方面，差會辦事處因應政局從上海遷至香港，並於1950年7月在港召開會議，商討內地及香港的事工。<sup>⑤</sup>1952年5月，正式成立港澳西差會，以范得勝（Victor Frank）為主席。差會下設傳道、基督教教育、文獻、神學院、學生、救濟及社會服務七個委員會，與香港浸聯會及堂會合作。<sup>⑥</sup>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原屬廣東協會轄下第六區會，1949年5月間，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甚至討論到是否在局勢進一步惡化時，把協會遷至香港。<sup>⑦</sup>1950年區會於年會議決宣佈獨立，1953年改組，易名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制定憲章，正式與廣東協會脫離關係。<sup>⑧</sup>

循道公會方面，隨着中華循道公會於1951年10月假漢口舉行全國大會，宣告與英帝國主義循道公會割斷一切關係，原屬華南教區的香港聯區隨即處於孤立處境。1959年，香聯區正式改組為香港教區，直屬英國循道公會海外差會，為海外教區之一。<sup>⑨</sup>

## 2. 香港的角色與局勢評估

1950年底，新中國政府要求基督教必須肅清帝國主義毒素，割斷與帝國主義一切關係，各教會組織在三自革新的旗幟下，紛紛宣告與原屬的差會組

<sup>④</sup> 載於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網站 [https://www.rhenish.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8&Pid=8&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https://www.rhenish.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8&Pid=8&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瀏覽日期，2024年7月16日〕。

<sup>⑤</sup> 美南浸會差會在1949年前沒有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參〈港澳浸會事工發展由來簡史〉，載於《華人浸信會史錄》第二輯，頁2。

<sup>⑥</sup> 《自立與關懷》，頁105–106。

<sup>⑦</sup> 吳義雄：〈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與本色教會運動（1919–1949）〉，載於章開沅主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第5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04。

<sup>⑧</sup> 鄭科林：〈區會事工概況〉，載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年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1955），頁7。

<sup>⑨</sup> 《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香港教區第一屆年議會紀錄》（1959）。



織斷絕關係，並驅逐所有傳教士離境。在這種情況下，原來仍堅持留守的差會組織人員及家屬亦陸續抵港，或等候回國，或思索前路。香港成為撤離內地者的集離地。<sup>①</sup>

不少撤至香港的「難民」傳教士，由於目睹大量難民滯港的需要，故積極參身難民救濟工作。誠如宣道會劉福群（William C. Newbren）所言：難民傳教士以滯港難民作為主要工作對象。<sup>②</sup>調景嶺難民營是當時主要接收中國難民的地方，在此情況下，該營成為難民傳教士最早投身服事的工場，其中



調景嶺難民營宣道會

以宣道會及信義會等遷港差會為主。<sup>③</sup>

不過，解放初期，不少歐美差會對香港前景仍持觀望，甚至悲觀的立場。例如，原設於湖北漢口的信義神學院因內戰影響，於1948年12月遷

<sup>①</sup> 僅中國內地撤至香港的傳教士，便有600多人，還有近300名牯嶺學校的傳教士子女。Phyllis Thompson, *China: The Reluctant Exodus: The Story of the Withdrawal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from China* (Littleton: OMF, 2000), p. 74。

<sup>②</sup> 劉福群著，李世勳等譯：《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122。

<sup>③</sup>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2000），頁81-108。

港。五十年代初，信義神學院曾面對是否要撤離香港的壓力。當時信義神學院成員差會之一的「豫中信義會」（Augustana Mission）擔心中共會以武力奪取香港，曾建議將神學院遷到北婆羅州（即沙巴），但有關建議於1951年2月19日為該院教授部及董事部聯席會議所拒絕。<sup>④</sup>美國約老會（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Mission）鑑於政局不穩，也決定自1952年起中斷對香港教區的一切資助。<sup>⑤</sup>

西方差會對新政權接管香港的恐懼，經過數年的觀察後，因着中國政府方面沒有絲毫舉動，而漸趨釋除。<sup>⑥</sup>1953年後，越來越多差會正式在港成立教區。例如宣道會總會在1953宣佈成立中國－香港教區（China-Hong Kong Field）。<sup>⑦</sup>1954年2月，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亦在道風山成立。<sup>⑧</sup>

從1953年起，我們看見更多傳教士重回香港開展工作。例如遠東宣教會（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原在廣州傳教的文玉棠師母（Mrs. Florence Munroe）回到美國後，瞭解到重返中國之不可能，卻又得悉大量難民湧至香港的迫切需要，認定這是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黃金機會」，遂作出來港的決定。<sup>⑨</sup>

<sup>④</sup> 蕭克諳：〈從瀘口到香港：中文神學教育轉捩之一〉，載於《神學與生活》第22期（1999），頁88；蕭克諳：〈香港四十年〉，載於《神學與生活》第11期（1988），頁5。另John LeMond, "A History of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Hong Kong, 1919-1993: From Isolation to Ecumenicit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6, pp. 96-112.

<sup>⑤</sup> 《會員會務概況：1987》（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1988），頁215。另《中國基督徒傳道會四十週年特刊》（香港：中國基督徒傳道會，1995），頁40。

<sup>⑥</sup> 周恩來在1954年8月正式闡述對港政策，指「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但時機尚未成熟，我們不要去談」。到1957年4月，周再說：「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礎，可以通過它吸引外資，爭取外匯」，所以「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參鄧開頌、陸曉敏：《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1997），頁246。

<sup>⑦</sup>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85。

<sup>⑧</sup> 《三十年大事紀要》，載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立會三十週年（1954-1984）》（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立會，1984），頁15。

<sup>⑨</sup> Florence Munroe, *Harbor of Hope: Eight Years of Answered Prayer in Hong Kong* (Los Angeles, Calif.: The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63), p. 6.



### 3. 多元宗派格局的形成

由於政權轉易關係，不少原來並沒有在港發展的差會及宗派的傳教士或華籍教牧紛紛撤至香港。他們目睹大量中國難民滯港，決定在此開展新的事工，延續其服事中國的異象。這些遷港的宗派包括：福音道路德會、宣道會、信義會、美國約老會、循理會、衛理公會、挪威聖約差會、華南水上基督教會、萬國宣道浸信會、加拿大聖潔會、美北浸信會、門諾會、使徒信心會、金巴崙長老會、中國佈道會、靈糧堂世界佈道會、中華傳道會等。同時，也有一些南下教牧信徒在港創辦新的宗派，如協基會、靈恩傳道會、樂道會、華僑傳道會、華西播道團等。香港宗派百花齊放的局面於焉形成。<sup>①</sup>

何明華會督早於五十年代初指出，已有 57 個宗派在港發展。<sup>②</sup>據 1956 年出版的《香港教會名錄》，最少有近 50 個差會組織在港成立辦事處。這些差會組織，部分直接成立及領導教會，部分以同工身份協助本地華人教會，部分則專注於福利及救濟工作。<sup>③</sup>至於駐港傳教士的人數，亦多達 300 人。<sup>④</sup>

據美北浸信會傳教士藍仁（Loren E. Noren）的統計，1962 年間香港最少有 60 多個宗派及獨立堂會，近 344 所堂會，11 萬名信徒，充分呈現出多元宗派密集的局面。<sup>⑤</sup>無論如何，香港這塊彈丸之地，結集了這樣多的差會及宗派，在普世宣教史上，肯定屬於非典型的個案。

<sup>①</sup> 〈延續與斷裂〉，頁 87-122。

<sup>②</sup> R. O. Hall, *Hong Kong: What of the Church?* (Broadway: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52), p. 13.

<sup>③</sup> 《香港教會名錄：一九五六》，頁 35-42。

<sup>④</sup> *Hong Kong Church Directory, 1956* (Hong Kong: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 1956), pp. 73-95.

<sup>⑤</sup>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Thir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By the Author, 1964), pp. 2-3.



### （三）「中國因素」與「香港因素」

五十年代香港教會最重要的轉變，便是從舊有的華南－香港格局中分割出來，成為具獨立意義的香港教會。筆者曾指出，「在 49 年前的一百年，不少差會及傳教士只着眼於中國（華南），而忽視香港」，香港只不過是華南教區屬下的一員。<sup>⑥</sup>但 1950 年後，情況便完全改變過來。由於內地政權轉易關係，大量傳教資源撤至香港，香港教會與華南教區的關係亦告中斷。香港教會在歷史上首次正式與中國－華南教會分道揚鑣，在獨立的處境下發展運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持續接收大量中國內地難民，在許多傳教士眼中，香港成為延續其中國異象的地方。從宣教運動的角度觀之，香港成為共產中國以外的「中國」（華人社會），共產政權使香港教會成為「保存」中國教會的根據地。同時，在冷戰氛圍下，香港教會不僅為「中國開門」默默獻上禱告，並且在福音廣播、文字出版，信徒培育方面，始終未忘「守望中華」的責任。

難民問題及人口問題，以及由此派生的社會危機，在在給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帶來挑戰。基督教也必須在此時此地的香港社會中尋索其使命，不同的差會、宗派及中西教會人士如何回應這些「本土因素」，對於基督教在港的發展，也是至為關鍵的問題。五十年代影響香港基督教發展的「本土因素」，主要仍是人口問題對社會的衝擊，特別在教育及社會救濟與福利工作上的緊急需要。基督教（差會、團體、教會）作為志願團體，其所扮演的角色，對紓解社會危機方面，是不庸置疑的。

也得指出，五十年代香港基督教的「中國因素」，也可以成為基督教與本地教會疏離的關鍵。一方面，基要主義的屬靈觀，特別是屬靈與屬世的二

<sup>⑥</sup> 參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教會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載於《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頁 9-30。

分思維，難免助長了教會及信徒的避世及出世的傾向。這對五十年代香港這個動盪的難民社會，無疑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趙世光曾說：「講到這裏，我就想到今日的香港、九龍，不但人口特增，罪惡也天天在那裏增加中，港九地方所犯的罪惡不亞於當初所多瑪城裏所犯的罪惡！要知道神是不改變的，恐怕到了有一日，神的審判也會臨到這裏，希望各位在萬事上將自己分別出來，得以免去將要來的大災難！」❶雖然在港服務的海外基督教福利組織及個別傳教士，力倡社會服務是福音見證的一部分，然而在大部分華人教牧眼中，傳教仍是其首要關懷，服務工作僅成為傳福音的工具。另方面，五十年代所倡導的所謂本色神學，同樣是與本地社會及教會脫節的神學反省。不論是以傳統國學或是宗教比較為進路的神學建構，二者都是沉醉於舊有的中國文化與宗教之內，未能適切地針對本地處境的需要。無論如何，五十年代仍不具備成熟的土壤來孕育植根本土的信仰與神學反省。

可以說，五十年代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既「延續」了百年來在華傳教運動的發展，又與中國教會的特殊命運「割裂」。而「中國因素」的介入，又在多方面重塑甚至改寫了香港教會的面貌。若果我們說五十年代以後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路向，迥異於五十年代前的格局與模式，也是十分合理的。



❶ 趙世光：《聖經寶藏》卷3（香港：靈糧刊社，1952），頁97。

## 二、難民社會的挑戰

### （一）難民社會

#### 1. 難民問題與人口問題

《香港年報 1956》(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的主題專文為〈人口問題〉(A Problem of People)，其中一段這樣總結香港社會在戰後的狀況：

回顧這些時期，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所作的事情，很少不會因此而有所不同。財政、教育、醫療及衛生服務、社會福利、監獄、警察、工業、商業、勞工關係、土地政策、房屋、農業及漁業、政治關係——甚至法律本身——全都受着這單獨問題的明顯懲罰（在某些情形下更是摧毀性的懲罰）。這就是大量移民入境的問題……❷

戰後香港社會深受人口問題困擾，日佔時期的人口僅60萬人，到1946年已增至160萬。❸新中國成立後，人口再次急劇增加。1950年春，香港人口已增至236萬。❹到1956年更突破250萬，估計其中100萬是來自內地的難民。❺100多萬的滯港難民給香港社會帶來沉重壓力。有社會學家指出，大量難民留在香港，「將本來以為是一個流動人口的問題，變成了實質上對社

❷ “A Problem of People,”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7), p. 2.

❸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4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48), p. 9.

❹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0*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1), p. 10.

❺ “A Problem of People,”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p. 3.